

# 柯岩之问:我是谁

□李冰



柯岩在创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在我的青春记忆中,第一次听到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是20世纪70年代,在大庆油田的一个礼堂。那时正看一部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电影,影片中,一个低沉凝重的男中音,声声呼唤着周总理,诗句情感炽烈,催人泪下。电影散场后,我们几个未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很费了一些力气,找到了这首诗以及为诗歌谱写的歌曲。于是,在油井星罗棋布的荒原上,我们开始背诗、学歌。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诗作者的名字:柯岩。说来有趣,因为从名字难辨男女,孤陋寡闻的我们还产生过“柯岩是男是女”的争论。有朋友说:“写出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柯岩肯定是男诗人。”

几年后,一部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让我再次看到了“原著柯岩”几个字。那时我已调到团中央,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看这部电视剧,如同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是娱乐消遣的心态,而是当作教科书来看。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课题,《寻找回来的世界》为我们描绘了失足青少年的内心世界,以及挽救他们的路径。

真正与柯岩面对面坐在一起,是在2009年,我去拜访柯岩,与她有了一次长谈。那时柯岩已八十高龄,但看上去不像——容颜不像,精气神不像,声音语速也不像。我有一大堆问题要请教,她有一大堆故事讲给我听。从《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寻找回来的世界》,从《CA俱乐部》到《与史同在》,从去大学讲座到加入抗癌乐园,讲者娓娓道来,闻者静静恭听。交谈一点儿也不沉闷,除了讲述很多生动事例,她还兴致勃勃地背诵《诗毛泽东》,那铿锵的诗句从她口中吐出,没有一点诵读的感觉,那么自然,那么真实,恰似这话语本来便存于她心底。长谈结束,她说要送我书,我便随她到另一个房间。房中有一张现在已少见的铁架床,一张老旧的写字台,其余都是书。有的书堆在桌上,有的书摆在床头,床边的地面上也摆着一排排与床齐高的书,真是“夜卧书从伴清灯”。在这里,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

2009年8月末,中国作协为柯岩举办了创作生涯60周年座谈会。来参加的世界各名家之踊跃是少有的,刘云山同志发来贺信,铁凝致辞,发言者中有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朗诵家、工读学校的代表、癌症病人代表、读者代表和外国友人。会议从上午9点多一直开到中

午12点,还有四五个人未轮到发言。最后,柯岩发表了答谢词,题为《我是谁》。这是我至今难忘的、诚挚而又发人深省的柯岩之问。

“我是谁”,是个古老的哲学和宗教问题。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哲学家帕斯卡都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柯岩不是进行纯理论探讨,而是联系成长经历自我叩问,是对人生感悟的深刻总结——搞清楚“我是谁”,就要“人贵有自知之明”,正确处理个人与党、与人民、与时代、与生活等的关系。

柯岩对“我是谁”的参悟用了一生的经历,对“我是谁”的回答用了一生的实践;

她清醒地牢记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她说,自己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不是葬身于饥寒,就是沉沦于黑暗。是革命队伍的关爱,是老同志和领导的心血,使她成为人民作家,对此,她常怀感恩之心。她把自己比作森林里的一棵小树,比作海洋里的一粒水滴,要尽职尽责地奉献一切。

她认真地践行“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从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她年轻时每年有8到10个月的时间深入生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写《寻找回来的世界》,去工读学校一住就是一年半,第二次去又是半年。在工读学校,她不是作壁上观,而是亲身参与,

实实在在地承担教学工作,身兼校长室秘书、大队辅导员、团支部书记数职。她不张扬,不炫耀,一直对自己作家的身份进行保密。在工读学生眼中,她就是一个普通教师,一个用心浇灌迟开花朵的母亲。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她不断地从工农商学兵的模范人物那里获得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锤炼自己的情操和人格。她自觉坚守社会责任,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共忧乐,严肃地对待自己作品的社会效益,为社会提供正能量,绝不胡编乱造,轻薄为文。

柯岩的回答又绝不止这些。

其实,“我是谁”是一个人的根性和原点,柯岩之问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常自省。试想,如果忘记“我是谁”,权力就不会异化,有些人就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仆身份,不会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贪腐堕落;如果忘记“我是谁”,政绩就不会异化,不会出现宁可破坏环境,宁可损害党群关系,宁可违背长远利益,也要追求为自己“脸上贴金”的短期效应;如果忘记“我是谁”,名望就不会异化,不会把荣誉、头衔、一技之长当作资本,视自己为精神贵族,虚荣心膨胀,忘乎所以地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如果忘记“我是谁”,也许利益就不会异化,不会被铜臭污染灵魂,唯利是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

方向。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例证明,之所以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我是谁”,迷失了自我,丢掉了根本,背离了宗旨,这些人何尝不需要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在回顾60年创作生涯时说:“如果问这长长的60多年中,我的长进究竟在哪里?我认为,那就是我终于弄清楚了我是谁。”这话虽有自谦的成分,但也说明牢记“我是谁”,有自知之明,确也不易。

柯岩体弱多病,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还摘掉了一个肾。2011年6月,柯岩再次病重入院,我去医院探望,她精神状态很好,不改乐观豁达。然而乐观归乐观,病情却在恶化,她后来两次入重症监护室,多次报病危。我去她所在的协和医院探望了十多次,每次贺部长(因贺敬之是中宣部老领导,我曾在中宣部供职,所以一直这样称呼)都在。这对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老夫老妻,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夫妻战友,什么是相濡以沫,正如启功先生诗句所言:“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

7月14日是柯岩的生日,那一天,我代表中国作协到病房给柯岩祝寿。柯岩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我们围在床边。奉上生日蛋糕之后,女儿小风带领大家一起为她唱起“祝你生日快乐”。这时,柯岩嘴角挂着微笑,眼中泛起泪花,渐渐地,泪珠滚落下来,我轻轻为她拭去。柯岩说:“照张相吧。”坐在床头的贺部长把身子靠过来,也说:“来给我们一起照个相。”这是柯岩的最后一个生日,不知是不是贺部长与柯岩的最后一次合影。

大约是那年年末的时候,我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突然听到柯岩去世的噩耗,于是径直赶到协和医院。小风说:“妈妈的遗体已送太平间,去看看爸爸吧。”贺部长孤零零地坐在会客室里,见我推门进来,要起身,我急忙过去一手握住他的手,一手按住他的肩膀,说:“贺部长,您节哀保重。”我第一次看到贺部长流泪,眼圈红红的,眼中噙着泪水。我心里很难过,又找不到安慰的话,在贺部长面前,一切流俗的安慰都显得多余。过了一会,贺部长深情地说:“柯岩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是个好党员,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

次日傍晚,我带着两瓶茅台酒去贺部长家。“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贺部长平时喜欢小酌,不知此时杜康能否解忧,能否起到一点儿改善气氛的作用。家中,小风、小雷都在,贺部长呆坐在沙发上。屋里静静的,冷冷的。我刚说两句话,贺部长的眼圈又红了。我怕再触碰那阴阳两隔的痛楚和伤感,立刻收起话头告辞。那天的晚饭,我真希望小风、小雷举杯劝爸爸节哀,祝爸爸长寿!

(转载自 2015年3月27日《光明日报》)

## ■赣南笔记·之一

我每次采风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案头准备,何况这是一次特殊的采风。

我对赣南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赣南与赣州,究竟是什么关系?所以我想,这次首先要搞清楚这件事。据当地朋友说,所谓“赣南”,就是指江西西南部。江西省简称“赣”,因此赣南也可以说是江西省南部区域的地理简称。它主要由赣州市下辖的2区1市15个县组成。赣南地域广阔,面积几乎占江西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大约占全省人口的五分之一。由于江西西南部的区域绝大部分隶属于赣州市,所以,赣南也就基本等同于赣州市。这里地处中亚热带,呈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地形复杂,而且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全境通行客家话。其中章贡区和信丰县城说赣州话。

赣南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曾经有过一段特殊的历史。我正是去寻找这段历史的遗迹才来到这里的。当然,在来之前,我已经有了写作的动机。

初到赣州,一天晚上,当地朋友请我去吃宵夜。朋友问我,想去什么地方。

在赣州吃宵夜,无非选择三种地方,或者有色,或者有历史,或者有特色而且有历史。于是我随口说,去灶儿巷。当时朋友感到奇怪,我第一次到赣州,怎么会知道灶儿巷。其实我早在来之前,就已对灶儿巷耳熟能详。这次到赣州,这条巷子也是我重点要去的一个地方。即使这一晚不出来吃宵夜,我也是要去灶儿巷的。

灶儿巷是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巷子,位于赣州老城区东部,是宋代赣州六街之一的阴街。明代时曾叫姜家巷。到清初时期,因为巷子里住着很多衙役,衙役多穿青衣,所以当地人称为皂儿,因此后来谐音就叫了灶儿巷。巷子虽不长,建筑风格却各异,有赣南客家和赣中天井式建筑,也有徽州以及西洋式建筑,多是店铺、作坊、旅馆、钱庄、衙署和民居等等。

在这个晚上,当地朋友引我到灶儿巷。

巷子是一个高大的石牌坊。夜晚的灶儿巷虽然静而幽深,仍能看清街面的鹅卵石和两边建筑的青砖烽火墙。义兴堂的门面仍完整,这里当年是烟馆,专卖烟丝和烟叶。筠阳宾馆在古时是一个会馆。赣州那时有许多会馆,如广东会馆、福建会馆、南宁会馆等等。当年这里曾有一个谣儿:“南宁会馆一枝花,广东会馆赛过它,安徽会馆平平过,福建会馆豆腐渣。”说的就是当时会馆的情形。筠阳会馆是一个保存历史最久的会馆,建于清光绪十九年。当时是江西高安人在赣州做生意时经常聚拢的地方。那时高安又称筠阳。宾馆谷则是一幢西洋式建筑。这里当年是一家宾馆,据说蒋经国在赣州时,经常在这里宴请一些重要客人。

我和朋友来到灶儿巷里的“董府”,这里过去是一个钱庄,天井式建筑布局。现在已经改为餐馆,专门经营赣南风味的菜品。穿过几进天井,我们来到最里面的一个院子。来这里自然是要喝酒的。酒酿是一种米酒,装在锡壶里,要温后才好喝。这时朋友才问我,这一晚,我究竟为什么要来灶儿巷。

我告诉朋友,当年,在这个巷子里曾发生过一件事。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随即,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苏区的进攻。10月26日攻占宁都,仅仅一个月,瑞金,于都和会昌相继陷落。至此,赣南根据地一片风雨腥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本人也在他的“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阡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而就在此时,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革命阵营中接连出现了叛徒。这不仅给苏区带来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苏区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个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亲自起草了《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的紧急命令。也就从这时开始,一场新的特殊战役,就无声地拉开了序幕……

大约在1935年初春,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从于都来到赣州。我想,这个人一定是面皮白皙,穿着一件已经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长衫,夹着一把油纸伞,看上去很清瘦的样子。那天应该下着雨,他从赣江的岸边走来,穿过烧饼巷,然后就这样走进了灶儿巷。这个中年人此行是来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而且,他执行任务的方式也很独特。

三天后,他没用一枪一弹,兵不血刃,就将一个叛徒处决了。

这个中年人完成任务之后,离开赣州应该是在一个清晨。他在临走前,还不慌不忙地在灶儿巷的巷口张贴了一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决这个叛徒的布告。

在这个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边喝着微热的酒酿,一边说着这个故事。几个朋友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已是深夜。我们从董府出来,走在灯光昏暗的灶儿巷里。脚下的鹅卵石街面在灯光下闪着幽暗的清光。这让我感觉,此时,这条巷子似乎是一条通往1935年的时间隧道。恍惚中,我好像看到那个面皮白皙的清瘦男人,正夹着油纸伞,抱着一个包裹朝我迎面走来。我在巷子里一边走着,朝两边的建筑看着,心里在想,当年这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人,他是住在哪儿呢?筠阳会馆?宾馆谷?还是……大通旅社?

从赣南回来后,这篇小说就写成了,题为《刀光》。

# 灶儿巷

呈松

以前从来没见过青岛的槐花。相反,对于青岛有樱花倒有印象,但不知为什么,对于樱花,我心中一直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我非常喜欢樱花这个名称,有时竟觉得它是百花中最有意味的名字,可惜它是樱花,于是我就远远地看,好像从没走近过。

我喜欢各种树木,但要我准确地说出哪一种树的名称和品性,我却不能。十分惭愧,除了知道从小陪伴我成长的桦树、柞树和榆树外,我再难分辨出其他树种。在我看来,没有开花结果的树木其外观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在榆树、槐树、柳树之间,我常常模糊他们的样子。即使是我早就熟悉的杨树,有一天我也突然发现,很难把握这种树的外貌和品质了。老家的野生杨树和后来人工栽植的北京杨显然是不同的,前者生长缓慢,树冠小,微绿色的树干上满是疤结,像生出一个又一个人的眼睛;而北京杨则生长迅速,树干光滑挺拔,虽然也会有少数的眼睛一样的疤结生长,却大得多,漂亮得多,很像少女的眼睛。柳树的品种也很多,我不敢断定偶然出现的柳树是哪一种,惟有垂柳的样子让我心安,我不必嘀咕会不会叫错它的名字。

好多年了,当我从故乡的丛林中走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地球上那么多树种。那些我不认识,叫不出名字的

槐树,每一种都很漂亮,它们一年四季发出的气味很相似,但又各个不同。我曾多次下决心,将来一定买一部树木大全方面的书,一定要图文并茂的。后来每当到书店,我都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书籍。

还有几次,专门找到北京的林业书店。可惜,这方面的书早年林业出版社有过出版,但并不是我希望的那般图文并茂。我发现,一些我还算熟悉的树种,比如杨树和柳树,当它们被缩小几十倍线描在书页上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对似是而非的概念,我历来难以投入精力和感情。加上这是多年前陆续出版的丛书,既不完整,价格也很贵,所以我至今一本也没有买到。

初来青岛代职的“五一”前后,天气还是清冷的。虽然草地上的蒲公英已经落尽,周围的树还远没有展开叶子。

在青岛驻地周围,我没有发现杨树。除了松柏和悬铃木外,更多的是槐树。过几天,槐树们自由自在地开了花。槐花并不耀眼,也不像樱花那般喧闹,盛开的槐花呈乳白色,半开或未开的则像一串串幼年的葡萄。不过,槐花的香是纯正的。每天早晨,连队出操,营门内外的大街小巷和广场上空,就飘荡着奇异的花香。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就是槐花的香味,只觉得有些熟悉,像桂花的香,但又有些不同。战士们说,这是槐花。继而告诉我,槐花是很好吃的,不少地方都有蒸食槐花的习惯。特别是槐花馅包子,简直是青岛百姓的最爱之一。

晚上,我在营区内伸手可摸的槐树上摘了两串槐花,我把这些整齐、素淡、香味扑鼻的槐花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又闻,然后再握在手心里感受一下槐花柔软、微凉的意

趣。最后,我拣出其中一枚放在嘴里仔细咀嚼,一股甜滋滋的汁液立刻贯通我的五官,在这一刻,不仅我的鼻腔、喉咙和喉咙深处,就连我的耳朵和眼睛里也冒出了槐花的清香。

以后几天,我不时发现有些大妈从山上下来,塑料袋里装满槐花,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竹棍,竹棍后端绑着一个铁钩。有一天下午,我从营门向外看,发现一个大妈正坐在营门外边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枝槐树枝,一心一意地摘槐花。于是我想起初调北京时遇到的一件事。

在北京,部队家属院俗称大院。我家楼下不远的地方,生着一棵香椿树,像对陌生的槐树一样,起先我并不知道这是一株香椿树。也是一年初春的早上,我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正用一根长长的竹竿钩镰往下钩鲜嫩的树叶——严格来说,的确不能叫树叶,那是香椿树的枝头。一簇簇绿里透红的枝头,被镰刀割下来放进篮子里。有人告诉我,这是香椿,北京人最爱吃的一种时令菜,市场上卖得很贵。这时我才发现,这株瘦弱粗细的香椿树,几乎没什么树冠了,粗粗细细的几个杈杈,正努力向四周伸展着,像一支支没有手掌的残臂。

第二年,又是这个时候,我看见两个邻居同时在钩香椿,可能这一年的香椿芽更少,他们贪婪而焦虑地忙活着,很有些你抢我夺的意味。行人来来往往,却很少有人抬头看一看顽强生长在树尖的几簇香椿芽,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疼痛。我想上前说点什么,但却犹豫了,我能说什么呢?我与他们一样是这个院子里的居民,我也爱吃拌在豆腐和炒鸡蛋里的香椿,如果他们不这样拼命地抢掠这鲜美的食物,我敢说我一定不会动心来钩一些吗?就在我迟疑着走开时,听到几声咔嚓声。回头一看,有两三枝茶杯口粗的树枝被拽断下来,在树干与树枝的连接部位,露出白生生的伤口……

我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我转身冲到管理科反映情况,想不到,这个值班的老军工人,一点不理解我和香椿树的意思,他悠然地背起手说:“都这样,不都这样吗?没办法,啥时这棵树死掉就干净了。”

现在,在青岛槐花飘香的日子里,我内心不觉同样产生一丝忐忑和不安:如果更多的百姓加入到恶摘槐花的行列,青岛的槐树会不会像北京的香椿树一样惨遭屠戮?

早操回来,我发现一位男士在营区内的小山上摘槐花,于是问身旁的战士:怎么还有老乡来营区摘槐花?班长老张马上告诉我,说这是一位转业干部。他经常回来,不但采槐花,还常常和战士们来聊天。老张最后说:他原来是我们的队长,与战士的关系非常好,他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很留恋。

我的心不觉一动。是啊,当兵的人,当过兵的人,谁能轻易割舍掉这份军旅情怀呢?我敢保证,这位转业的队长,绝不是为了摘槐花才来营区的。



齐白石作品

# 原上草

第29期